

风物 深度

2022香港书展直击：十室九空，靠文化和阅读赚钱的算盘以后还能打响吗？

当移民的人都移民了，留下来的人又失去支持香港书展的动力，在防疫政策下，内地读者又不能随时来港参与……



2022年7月22日，第32届香港书展开幕，青少年在一个本地出版社的摊位前看书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特约撰稿人 森恩 发自香港 | 2022-07-24

香港记者采访每年一度的香港书展，有个很有趣的“民间开幕礼”采访传统：在开幕前一刻，驻守在展馆大门后，等待保安员开启对门的瞬间，拍摄第一批冲进场馆的读者。

根据历届采访观察所得，这些读者以学生和家长为主，学生揸著背包跑跑跑，跑到心仪摊位前，接受传媒访问；家长一把抓住行李箱，跑到贩售补充练习的摊位扫货，受访时，往往有个看来是心灵受伤的孩子站在一旁，默默预测大好暑假要做多少作业。

自1990年代至今，香港书展都设在学校放假的月份举行，全港中小學生三五成群进场打卡扫书，家长搜罗作业，追星读者举牌欢迎明星、补习天王出书。今届书展上周三（7月20日）揭幕，学校受第五波疫情影响，早于春季被安排“提早放暑假”，导致“真·暑假”（真正的暑假）要到八月才放两周，几十万学生仍在刻苦上课，缺席这场“民间开幕礼”。这边厢书展入场人次少了以十万计的读者，也许是可预计的。

内地读者持续缺席的香港书展，需要寻找更多经营手法。而今届开始拒绝一些书商进场，应该是最瞩目也最受关注的举措，此举可说是相当成功，吸引香港仅余的传媒追访，亦衍生另类书展得以策展。

少了敏感书之后又如何？

首天书展读者疏落零散，跟2019年以前那种如水如鲫的塞人状态，自难相比；比较上届我来采访揭幕日的情况，今届目测则只有更少读者进场，这当然是受著学生未放假的影响，同时也反映一个现实：内地读者持续缺席的香港书展，需要寻找更多经营手法。

而今届开始拒绝一些书商进场，应该是最瞩目也最受关注的举措？此举可说是相当成功，吸引香港仅余的传媒追访，亦衍生另类书展如以山道文化为首的“香港人书展”得以策展，虽然最后是取消实体书展改为线上举行。

昔日各大书商因香港书展抽签或圈选而产生大量“花生”：如某出版集团长期占领显著摊位、小出版社成立联盟成功占据有利位置……由此形成了大家在有限空间争夺席位的行业气氛。当年一摊难求，只要跻身书展之列，自可踏出业务成功第一步。今届参展书商明显减少，在主场馆Hall 1有不少空置摊位，用摊位背板封起来的空间，目测、保守地估计，占场馆至少七份一（Hall 1E尽头空空如也）。

在这七份一被封起来的空间当中，会包括2019年以前，何韵诗出书、参展的那种空间吧，那时她的摊位常排长龙。今日何韵诗三字几近成为这个社会的

禁语。

在这七份一（1/7）当中，会包括2019年以前，何韵诗出书、参展的那种空间吧，那时她的摊位常排长龙。今日何韵诗三字几近成为这个社会的禁语。还有山道文化、蜂鸟出版等新锐出版组织，去年闪现历史书写新声，香港历史有了新生代参与编写，也不是没有可讨论的内容，编得出来已是诚意可嘉。而正因一系列书籍的出版，反证年前书展仍是个尚有些限度的出版自由之地。

而今新锐出版社被消失后，又由谁来接力？今届书展又有贩卖“集体记忆”的摊位，用小量霓虹装置（三联、青协）铺陈，成为显著的打卡位。它们表现了七八十年代香港民风与地景，只是其下方的出版物却仍如旧贯，无甚创意。

另一方面，今年少了“敏感书”，却有了不少创意之作，香港漫画家利志达搞大型桌游、年轻人搞甲骨文卡牌桌游，更有创造馆推出各类青少年读物，还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张爱玲在香港的专著、香港文学生活馆推出黄念欣专栏结集。他们守护的记忆有远有近，值得读者留意。

文化抗争的效用

这种文化抗争方式，比起街头血泪交集的、以生命与自由来付出的行动，可谓无色无味，当权者无法禁制或遏止。而香港书展在种种因素中，远离了这么一群知识人……

根据曾参与会展管理工作的消息人士透露，昔日官办策展香港书展收入（注：香港书展主办方为香港贸易发展局），足以撑起当局几个财政年度的开支，收入之丰，简直是天文数字。疫情过后，又有港版国安法，这场以文化、阅读挂帅的赚钱项目，还可怎样办下去？这正是本文以下希望探讨的课题。

2019至2020年激烈的社会运动、当权者回应的态度，确立了以政治光谱为基础的经济活动，标示反抗力量转移到用生活方式来表达。不管疫情有没有来临、移民潮有没有发生，一个崇优、求知欲最旺盛的社群，已习惯用生活方式来抗争。他们会出席官办的香港书展吗？这个问题这几个字写出来也嫌呃（骗）稿费。

不用问，这种文化抗争方式，比起街头血泪交集的、以生命与自由来付出的行动，可谓无色无味，当权者无法禁制或遏止。当香港书展在种种因素中，远离了这么的一群知识人，参展书商的质素，有没有进步的必要，实在不难想像。

黄色经济圈带动大量文化消费产品的交易，两年以来的生活抗争，带到全港每间小书店，尽管不会成为发达途径，每有“惩罚”（“鼓励消费”之港式 新用语）活动，大家都会去排队买书。在执法机构忙著拘捕“疑犯”（当中包括每年都在书展出书签名的知名人士）时，文化抗争运动已经产生了自给自足的生态圈。

我们可以这么想像：以体现香港出版及言论自由的香港书展，邀请不同光谱人物、书商参展，会产生什么效果？在人潮与经济上，必可有所增益，香港书展形象与声誉可在国际社会加分，读者在开放的气氛中，买到心仪书籍，“惩罚”书商，为香港书展注入新鲜的经营方式。

我们要问的是：香港书展“安全系数”这么高，有必要以禁止部分书商参展来维持繁荣稳定吗？如果有这个必要，为什么不把这些摊位让给推广“香港志”的摊位，让它的规模做得更大？

其实，上届书展并没有禁止这些书商参展。去年同一时间在场馆采访，看到这些书商人潮汹涌，书籍编制认真，作者亲身到场为读者签名，没有人叫口号，持守“静静地赢”（保持低调的抗争）原则，一本、五本、十本的买下来，以示支持。香港书展以其他理由禁止这些书商参展，当然有它充分的理据。我们要问的是：香港书展“安全系数”这么高，有必要做这些动作来维持繁荣稳定吗？如果有这个必要，为什么不把这些摊位让给推广“香港志”的摊位，让它的规模做得更大？当然，香港书展的决议者，应该知道书展多元的重要：书种多元、销售方式多样，才可吸引读者来支持。

读书本来无禁区。台北书展每三年换届，在业界推选董事出任统筹，民办的的好处在于，业界本来就是多元地存在，书籍品种也许因董事擅长出版的，成为某届焦点，但出版生态在一年一度的书籍展览活动来平衡，由读者用钞票来决定书籍命运，好比一次民间投票运动：大众才是书展主角。

当然，它也有官办的背景，好像今年六月的台北书展到底要否因应疫情延期，有人认为是某些官员太胆小，一时主导了业界，其后也总算与业界有了共识，部份出版社退租，也没影响展期。这种轮替主持书展决策，与官员共同商讨的文化活动，在“无禁区”的背景下，成为台湾加深文化力量的重要基础。

官办书展可有未来？

今届书展前夕，香港最有名气的作家倪匡先生辞世，但追悼气氛也没有吸引大众首日抢闸闯关买书留念，气氛异常地平静。人潮消失，场馆“十室九空”，腾出大量净地、围封摊位，就有了人去楼空的场景。

现在香港书展“禁区”尽管有“与出版自由无关”的诸多原因自圆其说，得出的效果却是严重警告了出版社切勿以身试“法”，在出版界的红线，已经画得非常明确了。不过，这些所谓“红线”其实又有没有准则？

根据我与内地出版社合作的体验，那个准则就是没有准则，因人而异。因此，偶尔会发现有些内地出版物，比香港出版的来得大胆敢言。反观香港书展的审视机制，不管是行政主导还是概念先行，都成为来届书商参展与否的考量。

官办有效率和专业行政的保障，业界参与决策有助灵活调度与改变经营策略。正如今日大书店都“诚品化”——贩售非书类的产品，以多元文创产品来维持各类消费者关注的热度，确保书籍零售作为主要产业的后盾。

这其实也是香港书展历来缩影。香港书展发展至今，基本上就是用明星（知名作家、专业人士、名人等）效应撑起的活动。历届几场记者会上，都用到“读者可来寻找心仪作家”的腔调，从1990年代邀请袁咏仪担任开幕嘉宾开始，就已确立“用人物吸引大众”的手法。

维持文化产业需要业界共议，在这个时刻，官办机构真需要与各持份者与委员会沟通。香港书展作为香港重要的文化活动，是否仍适合官办？

今届香港书展前夕，香港最有名气的作家倪匡先生辞世，在这个追悼气氛中，竟也没有吸引大众首日抢闸冲关买书留念，气氛异常地平静。人潮少了，场馆摊位满满，倒也不觉冷清。人潮消失，场馆“十室九空”，腾出大量净地、围封摊位，就有了人去楼空的场景。

维持文化产业需要业界共议，在这个时刻，官办机构真需要与各持份者与委员会沟通。香港书展作为香港重要的文化活动，是否仍适合官办，今届倒可察看一二。假如要维持繁荣稳定，何不干脆取消香港书展，多办几场“香港志展”、“政要重要讲话展”、“大湾区重要读物展”、“大湾区生活圈文化体验展”？

移民的人都移民了，留下来的人又失去支持香港书展的动力，在防疫政策下，内地读者又不能随时来港参与，长痛不如短痛，免得招牌毁得不明不白，勉强办下去。